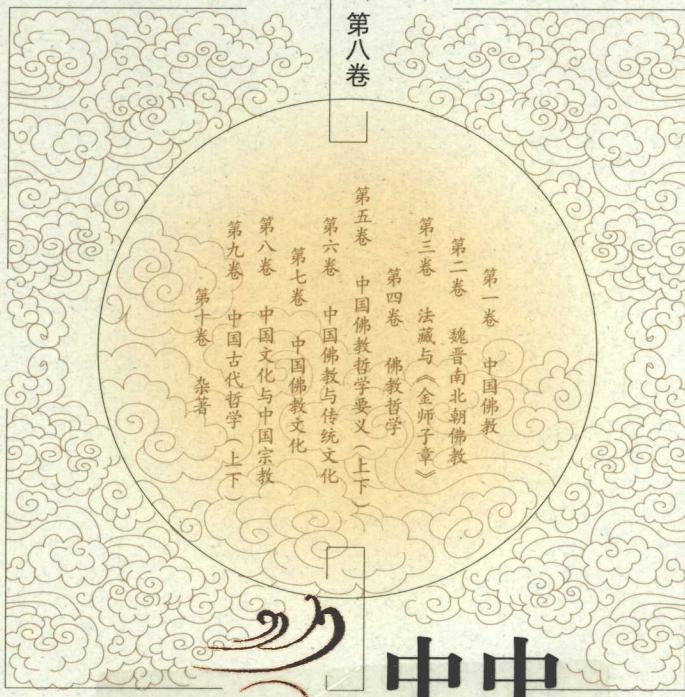


方立天文集

第八卷

中
国
文
化
与
宗
教

- 第一卷 中国佛教
第二卷 魏晋南北朝佛教
第三卷 法藏与《金师子章》
第四卷 佛教哲学
第五卷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
第六卷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第七卷 中国佛教文化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
第九卷 中国古代哲学（上下）
第十卷 杂著



方立天文集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
中国宗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方立天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5
(方立天文集; 8)
ISBN 978-7-300-15687-3

I. ①中… II. ①方… III. ①宗教-研究-中国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9205 号

方立天文集 第八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

Zhongguo Wenhua yu Zhongguo Zongjia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1.75 插页 4	定 价	860.00 元 (全十卷十二册)
字 数	298 000	本卷定价	58.00 元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

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 60 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部分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 80 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

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

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

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己！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方立天

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目
录

中国文化	001
儒学与佛教	003
积极投身于开创当代新文化运动	011
了解 改造 创新	
——张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谈传统文化	013
澳门文化起儒风	
——记儒学国际研讨会	023
早期儒家人格建构及其现代意义	025
刚健自强	
——方立天教授谈中华民族精神	031
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034
同情 开发 创新	049
孙中山文化观述评	051
传统文化的寻踪与阐扬	063
儒道的人格价值观及其会通	070
传统人生价值观与现代化	078
儒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影响	081
融合互补：未来的文化走向	092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切入点是什么？	094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	097
《西游记》与佛教文化	102
佛道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107
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思想	
——21世纪中华文化专家谈	121
儒家也应有一部典籍大全	123
为人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普遍意义	125
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	133
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	143
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149
为三晋文化咏叹	
——访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	153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	155
人文化解价值危机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需要和 精神追求	170
中国宗教	177
中国宗教十年	179
积极开展宗教学的研究	196
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198
宗教·生活·文化	
——访方立天教授	209
人文科学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重视开展宗教学研究	214
对当今世界宗教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	219
宗教与宗教学	
——方立天教授访谈录	221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224
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宗教学研究四人谈	226
从三个向度反思中国传统的宗教观	251
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宗教理论研究”	
座谈会上的发言	254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再审视	256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260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略论	281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国宗教的作用	284
走文化宗教之路	289
宗教和谐与大众传媒	293
宗教文化今天仍具积极意义	300
宗教公益事业符合时代的需要	
——在“首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上的讲话	305
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307
宗教教育：宗教发展之本	
——访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方立天教授	310
总结赵朴老宗教思想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316
宗教媒体与文化自觉	321
法律、道德与宗教 共同维系、助推社会和谐	326
发挥宗教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以佛教为例	330
重视建设中国特色的宗教社会学	335

中国文化



儒学与佛教

我国自汉代迄至清代，儒学一直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道学—道教和佛教则是两大巨流，儒、道、佛三股思潮汇成汉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洪流，此外还有一些支流。其中儒学和道学—道教是本土思想文化，佛教则是外来思想文化。从儒、佛两种思想文化的交涉关系来说，佛教是被接受的客体，儒学是接受的主体。儒学与佛教的关系史，就是这种主体对客体既反对、抵抗，又同情、接受，以至交融互涵、趋于统一的历史，也就是按照儒学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主体接受图式对佛教进行选择、吸取、改造和重构的历史，是在主客体相互激荡、相互摩擦中，寻找思想契合点、重合点的历史。这是中国乃至东方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巨大意义的史实。这篇短文拟着重从儒学对佛教的理论思想交涉的角度加以阐述。

一、儒学与佛教的思想交涉点

儒学与佛教几乎是同时在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出现的思想学说，是人类文化在古代东方的早期结晶，两者遥相辉映，分别蔚成世界性的巨大学派。儒学与佛教探讨的对象都是人，都对人生的意义、价值作出了独特的判断，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并设计出通过道德修养之

路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方案，各自形成了一套人生哲学体系。也就是说，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儒学和佛教都是主体性的哲学，是阐述个体的自我塑造、改良和完善，以实现最高主体性的哲学。由于地理、历史和传统等条件的不同，儒学和佛教的观点，虽有相通之处，但总的说来相距甚远。以下这些深层思想的异同，正是儒、佛两家思想接触、交涉的主要之点：

1. 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儒学重视人的地位，称人并天与地为“三才”，又强调人优于禽兽，为万物之灵，带有人本的色彩。同时儒学倾向于人在人伦关系网中存在的意义，而比较忽视个人存在的价值。佛教把宇宙间有情识的生命体分为两类十等。一类是佛、菩萨等“四圣”，一类是人在其中的“六凡”。六凡由高到低按等次排列为天（指天神）、人、阿修罗（魔神）、畜生、饿鬼、地狱。这六类都是没有解脱生死的，和已超脱生死的四圣相比，人的地位是低的。但人在六凡中居第二位，则处于较高的地位。佛教又说，天过于享乐，不会修行，畜生、饿鬼、地狱则太愚蠢，难得有机会修行，只有人身难得，可以修行，重视人的地位的转化。因此又和儒学重视对人的教化有一致之处。

2. 人生的价值：儒学认为人生是乐，主张“自乐其乐”，“乐知天命”。儒者强调从人的观感上看，一切现象都觉得是活泼泼地；人不滞情于外物，则乐自生于心中。佛教则从变化、流动，即无常的视角来观察人生，认为人及其所处的环境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自身的生、老、病、死，作为生理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人类对自由、永恒的主观追求，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形成冲突，这都造成了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乐与苦，儒、佛对人生价值的这两类不同看法，实际上反映了人生实现价值的不同方面。

3. 人生的理想：儒学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所以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内部整体的事情。由此，人生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涉世、入世的。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人间世界是苦海、火宅，要求出家脱离日常生活，进而超越现实世界，成就为佛，是超世、出世的。所以儒学具有强烈的现实

性和政治性，佛教则具有鲜明的虚幻性和超俗性。两者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4. 人的生死：儒佛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看法的不同，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即对人的生死有不同的了解和态度，由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又必然引出鬼神问题。生死、鬼神问题是牵动人们情志不安的大问题。儒学认为人的生死是自然现象，有生就有死；同时由于男女交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人类是生生不息的，“生生之谓易”。孔子关注人生，而不重视人死，“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独重现世而不讲来世。佛教则大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与儒学重视人生问题相比较，佛教重视人死的问题，由此就必然生出一套鬼神系统。这都是儒佛两家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5. 人伦与道德：儒佛两家对人伦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又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儒家重视现世，必然重视人际关系，有五伦、三纲、六纪的区分和规定。与儒学笃于人伦不同，佛教超俗出世，要求出家修行，专心静修，屏除百事，这就必然淡漠人世，弃绝人伦。但是，佛教不仅与儒学同样重视个体自我道德修养，而且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如五戒、十善等，实质上也可说是被神圣化了的世俗道德。在修养实践上，儒佛虽然修养方向和修养具体方法有所不同，但都重视个体向内用功。孔子主张“为仁由己”，“默而识之”，后来儒家要求在人伦日用中，随处体认，以尽性知命；佛教讲止观、内照、证悟。两者在修养途径上有相通之处，由此两者又都重视心性本源的探讨。

上述问题就是儒佛两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交涉点，正是在人生价值和主体塑造等问题上造成了两者相互碰撞、摩擦、冲突、斗争，同时也造成了两者相互调和、融会、吸取、合一。这是我们在探讨儒学与佛教的关系时，首先应当把握住的。

二、儒学与佛教思想交涉的形式

自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日起，儒学与佛教思想一直相互激荡，未